

欲采蘋花不自由

复古思潮与中唐士人心态研究

YUCAI PINGHUA BU ZIYOU
FUGU SICHAO YU ZHONGTANG SHIREN
XINTAI YANJIU

杨伯 著

破額山前碧玉流
騷人還駐木兰舟
春風無限綠楊柳
欲採蘋花不自由

南开风文丛

欲采蘋花不自由

——复古思潮与中唐士人心态研究

杨 伯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采蘋花不自由：复古思潮与中唐士人心态研究 /
杨伯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12
(南开风文丛)
ISBN 978-7-310-03611-0

I. ①欲… II. ①杨… III. ①社会思潮—研究—中国—唐代②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D092.423②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3020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1 插页 332 千字

定价：2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杨伯的书稿又一次摆在了我的桌前。上一次是作为博士论文。当时的想法，是不带任何模式框框，历史面貌是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目的只有一个，描述出历史的生动的面貌。杨伯如期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应该说，写得不错，评审和答辩都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首先是杨伯自己不满意。我当然也期待他写得更好。要清理和思考的问题又太多太复杂，博士期间用于论文写作只有二年时间，毕竟匆忙了一些。而且我知道，不论对中唐复古思潮，还是对整个学术，杨伯都有自己的很多很深入的想法。他的这些想法，和当前被很多人所接受的观点和做法（用杨伯自己的话说，是主流答案）都不一样。经验告诉我们，要把一种独立的深入的想法贯彻到所研究的问题当中，需要时间。这就又有了几年。在杨伯，是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一步不懈地继续啃他的问题。在我，则是近乎焦虑地耐心等待和期盼，就像期盼深山十年炼剑的第一次精彩亮相。

新的书稿终于拿出来了。书写的是复古思潮和中唐士人心态。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很难写出新意的课题。因为不论写思想还是写文学，在这一园地里耕耘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其中不乏有思想的名家大家。凡做唐代的，还有做整个思想史的，几乎都要对中唐审视一番。前人成果中，不乏高高耸立让人敬畏的大山。从这样的一座座大山上攀登过去，是需要勇气的。我欣喜地看到，杨伯的书中正有这样的勇气。书稿完全是按照杨伯自己的想法来写的。如他在

“导言”中所说的，他是思想史的写法。相对于哲学概念、命题的分析评价及其深化进程的描述，他更关注概念、命题背后的历史情境。复古思潮自然要涉及这一时期的“古文家”，他也不是就古文谈古文，而是把“古文家”们融入更为宏阔的历史图景之中。他不愿意遵循带有强烈目的论色彩的研究方式，不愿采用简化的办法，而希望保留历史的丰富面貌和生动细节。他不愿脱离思想谈文学，脱离文学谈思想，而是把文学史的研究和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由此透视中唐士人的精神历程。他希望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复古”的诉求，在不同个体、群体那里，分别意味着什么？它是如何在代际之间传播、变异的？作为一种思想载体，“复古”被不同的言说者赋予了哪些新的内涵？新思想新观念的提出，又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政治情境有着何种关联？而最重要的，中唐士人种种思想言说、政治运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灵世界？他考察士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是研究士人心态必须研究的核心问题，但他不仅研究以皇权为权力的政治权力。他把知识也看作一种权力。他力图透过思想主体的心态变化，探讨这一时期士人一方面如何试图依照自己的理想改变现实政治，另一方面，为了处理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又如何对所持的理念进行调试。以往的研究，总习惯于把复古思潮与中唐散文联系，复古思潮等同于古文运动，论及中唐诗，则仿佛是另一种思潮；人们习惯研究复古思潮对文学的影响。杨伯此书则还试图探讨复古思潮与中唐诗风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想法。这些想法，应该说是成熟的，很有见地的。这不仅是对这一课题所研究的具体问题的重新审视，也是对整个学术现有研究思路、研究范式的重新审视。应该说，这样的审视，带有学术研究范式创新的性质。

正是沿着这样一个新的思路，本书对复古思潮和中唐士人心态提出了很多新的看法。他借用了文儒这个概念，又赋予新的含意。他以萧颖士为早期复古思潮的代表，因此他的论述，也就从盛唐天宝开始。他提出，萧颖士是盛唐文化的产物，也是盛唐文化价值的代表，但是，随

着政局的变化,他和他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被边缘化了。正是这种边缘化的境遇,引发了他的矛盾心理,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激进论调。萧颖士的目的,是通过激进的主张,使自己重新成为新文化、新价值的中心。而他所倡导的新价值,有助于将一批同样疏离于时代的边缘士人聚集在一起,在他们中间形成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认同感的形成,使这些士人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群体自觉。而这一切,正是复古思潮兴起的最初机缘。到了肃、代二朝,复古思潮越来越强的政治诉求要求士人摆脱“边缘境遇”,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崔祐甫。在这之前,复古思潮主要借助自身声望,通过乡情、族谊、科场关系等私人渠道传播,集中在河洛和江南等有限的几个区域。到了这一时期,则通过政治运作,使许多复古成员进入中央一级政治机构,并使复古思潮得以在长安扎根。崔祐甫“拟官多涉亲故”的最大贡献,就是促成了复古思潮发展方式的转变。到了德宗贞元时期,复古文士已蓄积起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不仅有了政治上的诉求,在文化上也有了新的要求。贞元八年的“龙虎榜”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既是复古文士的政治突围,又是一次文化突围。这时值得注意的另一事件,就是陆、裴之争或说反裴运动,以及相关的贞元“清流文化”。到了元和,一方面延续前代反文归质的救世主张,与世俗疏离的人生姿态,自学的谱系意识,一方面又着力于实质性扭转儒学失语状态。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丰富和深化儒学话语,韩愈的理论诉求,在于建构某种儒学本位论,强调人间秩序,强调道德内省,捍卫儒学正统地位,从他的“原罪”说就可以从一个侧面探究他的儒学革新和生命体验;柳宗元则试图通过对传统儒学的再诠释,开创出新的政治伦理学,解决道德和事功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复古思潮,与中唐的文学风尚和文学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复古思潮和中唐士人心态的发展脉络。这个发展脉络的总体思路和基本观点,是属于杨伯自己的。他对这一问题的多年来独立而深入的思考,终于以一种严谨论述和细致清理的形式

呈现出来了。关于复古思潮和中唐士人心态,还会有很多话可以说,但杨伯的这些论述,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有助于我们弄清历史的面貌。

这部书的新意还不仅在于此。他选取的论述主体非常独特。作者有意忽略一些人和事,有意引入一些被忽略的人和事。韩愈、柳宗元作为中唐思想和文学的核心人物,自然要纳入。萧颖士作为复古思潮的前驱,也在论述范围。这时一些重要的古文家,如独孤及、梁肃、柳冕,中唐思想史的另一一些重要人物,比如李翱,中唐文学的一些重要作家,比如李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都基本上没有正面论述。相反,一些政治人物,如崔祐甫、陆贽、权德舆,文学上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比如韦渠牟,却被作者引进,作为深入历史现场的重要媒介。对近年来研究状况稍有了解,不难发现,作者这样做,和我们时兴的或说主流的做法确实很不一样。这样做,可能会有争议,会有不同看法。完整地把握一个时期的历史面貌,与此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特别是重要人物和事件,确实应该纳入视野。但是,如作者所说,对一些重要文士,作者自忖未能向学界贡献新知,因此从略。一部著作,尽谈自己的新知新见,不愿重复前人说过的话,这无疑是一种非常严谨的学术态度。较之为求论述全面完整,不论有无新见,一律面面俱到,翻来覆去重复前人之见的做法,无疑更值得嘉许。当然更主要的,从“后记”和“导言”可以知道,从方法论来说,作者本来就怀疑“全面描述”的做法,怀疑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历史规律,怀疑是否真的存在某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释一切的规律。作者本来就不想作教科书式的综合描述。作者有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研究的,不是复古思想内在理路的演化,而是它的传播、发展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是一般的哲学史,而是复古思潮与士人心态的变化;不是一般的文学史,而是复古思潮与文学的关系。根据这一研究思路,作者对于论述主体的选取,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经过精心考虑,严谨科学的。经过作者的分析,我们发现,作

者选取的论述主体,都是复古思潮和中唐士人心态发展的重要一环,正是论述主体的这种精心选择,使历史的脉络更加清晰。当然也提出了很多前人未曾提出的新问题,比如韩愈的原罪说,柳宗元的自污说。

作者善于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甚至历史的细节,把握历史的整体脉络和宏观大局。按作者的说法,这是一种大问题之下的小个案的做法。论述主体的具体人物,就是一个一个小个案。在对具体人物事件进行分析时,作者仍然善于抓个案,抓细节。从萧颖士的晚节看安史之乱前后士风转变,从崔祐甫的“拟官多涉亲故”,分析代、德之际复古文士的权力运作,论贞元朝士而着力分析“龙虎榜”和“反裴运动”,分析陆、裴之争,分析代、德二朝的礼学探讨,看儒学的失语,看韩愈他们复兴正统儒学的意义。作者因此有很多考证。他考萧颖士的晚年事迹,考证他“不见永王璘”之事,考《新唐书》相关记载之误,考崔祐甫“拟官多涉亲故”,考证“龙虎榜”之得名。常常是一些看似细微末节的考证,正是从这些人们不太注意的细微之处,探寻政风、文风转变的讯息。史书记韦渠牟“仍谥”,就这么简单的二个字,谁注意到了呢?但是作者注意到了,并且由这样的细微之处,探寻当时关于他的谥号是发生过争论的,而谥号之争,透露的是君主与士大夫之间隐秘的政治博弈,而这对于我们理解贞元、元和之际的文化转型是至关重要的。细节的详尽考证和历史发展的宏观把握和理论阐述,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研究路数,作者却近乎奇异地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个案的分析乃至细微末节的考辨探究历史的讯息,通向宏观和理论的把握,应该说,作者是成功的。他的论述因此很坚实,很生动丰满。从研究方法来说,也是很有新意,很可取的。

作者因此对中唐思想史上一系列几乎成为常识的方法和结论做出了新的反思。比如韩愈,作者注意到他的思想历程中有过“原罪说”,而“原罪说”透露出他伦理观中两个主要倾向:强调人间秩序,强调道德内省。它们包含某种思想史转型的讯息。在韩愈的想象里,宇宙之中遍

布着残酷的伤害,以及由此而来的丑陋的伤痕,这种对丑陋、残酷的偏好,几乎成了韩诗的一个标志。这就对韩愈诗的以丑为美,对当时怪奇诗风的成因作了全新的解释。比如作者指出,元、白的“新乐府”写作,他们的风格,同样是反潮流的,反潮流的背后,同样是浓厚的道德意识。比如关于韩愈,向来以为他的文以明道是重理性的,而不平则鸣说则是重感情的,两者并不统一。作者则通过对韩愈《送高闲上人序》的分析发现,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提出的抒情观,本身就是其扶树教道立场的延续与深化,在这里,抒情与明道达成了辩证统一。像这样对传统问题的全新解释,在书中随处可见。

这部著作有很多很好的历史和理论分析。作者分析萧颖士的边缘化境遇和否定性文化姿态,分析这些文人的文化认同,分析安史之乱前后的士风转型,分析贞元时期复古文士的文化突围和清流运动,分析韩愈的“原罪”观念,分析柳宗元天论中的英雄人格、“大中”观念与新型政治伦理,分析柳宗元新哲学的尴尬与孤独,分析自污这一中唐思想史的特殊现象,分析这一现象的特点和渊源,分析孟郊干谒及其失败的原因,分析孟郊的诗学渊源,这些分析,很多称得上精彩二字。这部著作不以艺术分析见长,但对所涉诗文作品的分析也是很有特色很见功力的。作者的侧重点,在从诗歌探寻思想和士人心态的发展轨迹,而这种探寻,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作品的艺术内涵。他分析韩愈诗中的道德元素,分析他作为卫道者的诗性言说,分析他如何把不平之气根植于坚定的儒学信念之中,既情炎于中,又转化为勃然无法释怀的情绪,分析柳宗元作品中的英雄落寞和孤往精神。作者常常谈出新意,这种新意,正体现了对作品的很到位很深入的体悟和把握。

杨伯是我的学生。上面说了这么多称美这部书的话,可能会有偏爱之嫌。但我以为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从这部书里,我读到的是学术的特点和锋芒,学术的朝气和锐气。它常常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你能想到柳宗元的自污说吗?你能想到韩愈的原罪说,并且把它和道教

史料《太平经》联系起来，并且用这种认识来说明怪奇诗风的成因吗？你能想到用韦渠牟来说明这一时期文学风尚的变化吗？你能想到用崔祐甫的“拟官多涉亲故”来说明复古思潮发展方式的变化吗？都出人意料，写来却在情理之中。这样一部书，要说出它的缺点是很容易的。比如有些地方引例过繁过多，引诗常常全诗引用。特别后二章。这些地方，如果引例能更精练一些，或者化入论述之中，有些大家熟悉的诗例不一定引出原文，至少不引出全文，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写作习惯，这是不可强求的。何况这样写法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引文和作者论述可以直接对照，更便于突现作者的思想。比如可能仍会有人提出，何以不作综合的全面论述，何以不论及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的文士。这一点，与其说是它的缺点，不如说是它的特点。做学术最重要的是它的棱角和个性。与其四平八稳地架构一个完整全面的体系，我情愿要这样一部书，很有思想个性、学术棱角和锋芒，当然也是很有创新精神的一部书。经过几年等待之后，读到这样一部书，我是很欣慰的。

杨伯有很好的做学术的素质和素养。他读了很多书，从高中时期他就喜爱古代文学，就读了很多书，买了很多书。经过大学本科、硕士生、博士生，他读的书是越来越多。眼前的这部书，就融入了他长期读书的知识和学术积累。看得出来，这一时期文学、历史、思想的书籍，相关的研究成果，他都读过了，而且很多书读通了。他有很强的学术理解力和把握能力。还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教过他。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很有学术见解。他的那一篇毕业论文，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国内某著名高校评选为全国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后来他从我读硕士、博士。因为成绩优异，他被免试直接攻读博士学位。我们经常谈论学术，知道他的学术眼光是很高的，很多所谓的学术，他是看不上的。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我们确有不少一般化的所谓学术。过眼云烟的东西太多，敲门砖的学术太多，敲职称之门，敲利禄之门，敲仕途之

门,就是不敲学术之门。他是愿意做真学术的。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杨伯的发展问题。一是学术环境。现在他的学术环境还算可以,当然如有更好的学术环境,就更理想,对他的发展更为有利。二是找准学术发展方向。从眼前这部书看,他大体已经找到了学术的感觉和定位,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方向。三是不要懈怠,不停地努力。手里有好箭,一是要找到学术之的,二是要把它放出去,不要只是拿着品鉴赏玩。当然,如何发挥自己的思想个性学术特点,又吸取众家之长,也是需要考虑的。杨伯还年轻,期待他有更高的学术建树。

卢盛江

2010年8月21日

目 录

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复古思潮与中唐政治情境	(10)
引言	(10)
第一节 论开、天之际文士的“边缘”心态：中唐复古思潮成因的 社会心理分析	(12)
第二节 萧颖士晚节考：肃、代之际复古思想的新变	(32)
第三节 崔祐甫“拟官多涉亲故”考：代、德之际复古文士的 权力运作	(50)
第四节 从“龙虎榜”到“反裴运动”：理想与皇权之间的 贞元朝士	(67)
第二章 复古思潮与中唐思想困局	(97)
引言：贞元、元和间复古思想的延续与困境	(97)
第一节 韩愈“原罪”说钩沉：从儒学革新到生命体验	(116)
第二节 从“天说”到“车说”：柳宗元士人伦理平议	(131)
第三节 自污：中唐思想史的特殊现象	(155)
第三章 复古思潮与中唐文学风尚	(174)
引言	(174)

第一节	韦渠牟“仍谥曰忠”考论：从贞元政局看中唐文学风尚的转移·····	(175)
第二节	孟郊的干谒：韩孟诗派之前史·····	(187)
第四章	复古思潮与中唐诗学转型·····	(211)
引言	·····	(211)
第一节	复古诗学的早期实践·····	(212)
第二节	“情炎于中”与“勃焉不释”：韩愈抒情观之重估·····	(254)
第三节	儒者人生的诗性表达：韩诗中的道德元素·····	(272)
第四节	韩愈范式：韩孟诗派的思想史考察·····	(318)
第五节	抗拒平庸与孤往精神：柳宗元的诗学品格·····	(336)
参考文献	·····	(372)
后记	·····	(383)

导 言

按照学界的习惯,中唐,通常是指自代宗大历元年(766)至文宗太和九年(835)这七十年的历史。本书所指涉的要比上述时间段落提前一些。本书论述的上限,是玄宗天宝元年(742)或稍前,下限是宪宗元和十五年(820)或稍后,跨度仍是七十余年。

众所周知,8世纪末到9世纪初的七十余年,是唐代历史上一段非常关键的时期。在政治上,这是唐帝国盛极而衰,继而谋求复兴的七十年。与之相应,帝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格局、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变化,甚至促成了中国社会由中古到近世的转型^{〔1〕}。在文学上,作家群体经历着世代交替;文学观念、趣味多元共存。南方、北方,不同的文学传统相互激荡;新的文学样式日渐兴起^{〔2〕}。这是一个高潮逐渐

〔1〕 关于中唐政治变迁,可参看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对于中唐社会更为广泛的概述,可参看黄正建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对于唐宋转型问题的概述,可参看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风貌,可参看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文学观念的地域因素问题,可参看陈弱水:《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原刊于《郑钦仁教授荣退纪念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后收录于《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消歇却又孕育出另一个高潮的七十年。在思想上,儒学、佛学在相互刺激中各自经历着转型^{〔1〕},士人的价值观念、精神世界也发生着缓慢而深刻的变化^{〔2〕}。这是思想史上转机初现,而又“草色遥看近却无”的七十年。

本书不是对这七十年文学史进程的全面研究,虽然其中涉及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文体、主要文人。

本书不是对这七十年思想史进程的全面研究,虽然其中涉及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者、主要思想命题。

本书不是对这七十年政治史进程的全面研究,虽然其中涉及了即便专门政治史著作也很少言及的政治家、政治事件。

本书要讨论的,是这七十年中极为特殊却又牵涉甚广的思想现象:复古思潮。众所周知,玄宗开元、天宝之际,萧颖士、李华等新一代文士崛起于文坛,他们的文化态度与以往士人有所不同。其核心精神,就是复古。他们的复古诉求涉及多个领域,比如社会道德、文化教育、考试制度、经典阐释、文学书写,等等。但是他们的影响,又不能仅从某些具体领域来探求。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颇为激进的文化态度深刻地型塑了其后几代士人的心态和人格,并由此影响了中唐思想文化的诸多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复古主张在其后的几代人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思潮。

和一般的哲学思潮不同,“复古”算不得什么新思想。复古,也不是什么思想。它是一种思维模式,是许多观念、表述的集合。这些观念和

〔1〕 关于中唐儒学转型,可参看张跃:《唐代后期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李申:《隋唐三教哲学》,巴蜀书社2007年。关于佛学的转型,可参看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 对于这一时期士人价值观念、精神世界的讨论,可参看葛晓音:《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收录于《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尤其是其中《总说》、《思想史中的杜甫》等篇。

表述代代因袭,如盐入水,很难把它们从思想当中剥离开来。中国古代,不容易找到绝对的复古主义者,绝对的“反复古”主义者也同样难以寻觅。任何思想,可以很保守,也可以很激进,或多或少,总会夹杂一些观念和表述,于是,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复古”。有的时候,复古很简单,无非几阙弹不厌的老调;有的时候,复古就不那么简单,它会成为思想滋生的土壤,甚至思潮流涌的动力。它可以作为笼统的语境,若隐若现;也可助长某种情绪,咄咄逼人;还可以支撑高尚的价值体系,俯瞰俗世。单是指出某某复古,某某反之,没有任何思想史的意义。关键在于,复古在什么时候只是一串套话,又在什么时候成为一种力量。本书的目的,就是具体而微地解释,作为一种颇为含混的文化倾向的“复古”,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成为影响中唐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力量的。

对于中唐复古思潮,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论述策略。

常规的做法,是将其纳入以韩愈、柳宗元为中心的古文运动的脉络之中。关于中唐古文运动,我们已经所知甚多,甚详。这当然首先得益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领域的丰厚成果。但是,单纯的古文运动研究无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一,“古文”这一概念尚待审查。它的内涵、外延仍缺少明确的界定,学界在使用时更是常常将其与“散文”混淆,把古文运动的发展史讲成散文文体的胜利史,这是有悖于历史的。二,通常被视为“古文家”的文士们,其主张并不仅仅限于文体改革,甚至不仅仅限于文学改革。他们强烈的政治、思想诉求与政治史、思想史的关系如何?这是单纯的文学研究无法回答的。三,虽然我们已经对任何一位重要“古文家”的生平、理论、创作有了充分的了解,但对所谓“古文运动”的“运动”方式和轨迹,我们依然所知甚少。

哲学史、思想史是相互关联又极为不同的两种研究范式。在通常的哲学史著作中,唐代哲学,尤其是唐代儒家哲学并非重点,而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命论,加上李翱的复性说几乎成了唯一可谈的东西。作为背景,一些早期“古文家”也会进入哲学史家的论述视野,但仅

仅是作为背景而已。哲学史家关注的,是概念、命题的分析、评估以及对其演化进程的描述,至于概念、命题背后的历史情境,并非他们的兴趣所在。与之不同,思想史家更加注重思想者及其历史处境。近年来的一些重要思想史著作,试图将萧颖士以降的“古文家”们嵌入更为宏阔的历史图景之中,把他们的言说视为对所处环境的“创造性反应”。这无疑会使我们对“古文家”们的认识丰满许多,深刻许多。

与文学研究相比,哲学史、思想史研究通常采取更为宏大的时空参照,即儒学的复兴和中国思想的唐宋转型。这当然可以使我们对中唐士人及其言行有更为透彻的认知。但是,换个角度讲,这种带有强烈目的论色彩的研究方式,也会使本来多元的中唐思想受到过分的简化。事实上,现在的思想史研究多是透过宋儒的目光审视中唐。不少丰富的思想史细节在“理学”、“道学”、“宋学”一类的透镜之下被过滤掉了。

文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相互隔阂,也是中唐研究的一个重要障碍。按照包弼德先生的判断,中国思想的唐宋转型,是由“文学”向“道学”的转向。^{〔1〕}在中唐,“道学”初露端倪,而“文学”虽然发生了“脱中心化”^{〔2〕}的迹象却依然占据着士人精神世界的核心位置。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脱离思想而谈文学,脱离文学而谈思想,都是危险的。

本书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我的目的,是把文学史、思想史绾合起来,由此透视中唐士人的精神历程。按照英国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的说法,思想史的任务应该是回答如下诸问题:“给定的观念在任何一个正好提到它的个体思考者的思想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或者,这个观念在它所出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给定时代的思想环境中,居于何种地位,典型的或不寻常的”,以及“什么问题 是某种用法或表达式想要回答的”、

〔1〕 参看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参见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之“总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